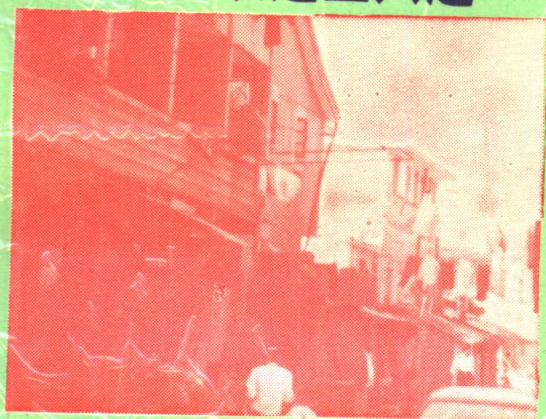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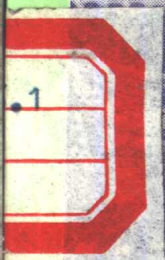
高洪兴 著

上海谭

会馆街——
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上海谭

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

会馆街 ——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

高洪兴 著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202 号

上 海 谭

阿拉上海人——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

浦东——新上海的一半

五角场——“大上海”的兴衰

会馆街——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

乌泥泾——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

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

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国权路 579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竞成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3 本册字数 47,000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300

ISBN7-309-01038-8/G·172

全 五 册

定价: 24.00 元

新 书 目 录

内 容 提 要

《上海谭》为刻画上海社会生活风貌的小型书系，由《阿拉上海人——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》、《浦东——新上海的一半》、《五角场——“大上海”的兴衰》、《会馆街——外码头大从这里兴起》、《乌泥泾——绫布二物，衣被天下》五册组成。每册选取一个视角，依据史实，勾勒近代以来上海人与上海滩的典型状况，叙述生动，多有新见。对于本地的民情风物，“谭”得贴切而有趣味。全书不仅地方色彩浓郁，而且充分展示时代气息，可适应机关、企业和学校等各界读者的需要。

责任编辑 仁 人
封面装帧 郑 群
责任校对 张利勇

目 录

黄浦江畔会馆街 [1]

[1] 一 黄浦江畔会馆街

[1] 最浓是乡情

[6] 从会馆到同乡会

[13] 二 游子寓客回娘家

[13] 联络乡情

[21] 济贫解厄

[30] 妥安孤魂

[38] 三 富商巨子图腾达

[38] 操纵会馆

[42] 附骥扬名

[48] 把持工商

[58] 名利双收

[62] 四 一枝红杏出墙来

[62] 惠及家乡

[68] 沪滨建功

[72] 泽被四方

[79] 五 会馆一去不复返

一 黄浦江畔会馆街

在董家渡天主堂南面，有一条会馆街。会馆街西面，有一条会馆后弄。由此而北向市中心走去，来到小东门外，又有会馆弄与会馆横弄。这几条以会馆命名的路，都在原先的上海县城外的黄浦江畔，它们是那么的不起眼，不仅匆匆过客不记得它们，即使是久居沪滨的老上海也差不多将它们遗忘。然而它们实在不该被遗忘，而可以告诉人们一段丰富多采的历史。会馆，在近代上海曾叱咤一时，声名显赫，有着很大影响，发挥很大作用。上海这个由客帮势力在工商、金融、交通各业中执牛耳的大都市，在相当程度上，与外码头人的会馆是分不开的。

最 浓 是 乡 情

会馆是一种同乡组织，会馆的产生源于中国

传统文化中的乡土观念。

乡土观念是支持同乡组织的一种精神力量。它孕育于乡土的自然环境，根源于乡土的社会关系，陶冶于乡土的特有文化，渐成于乡土政治地理区域的历史传统。

乡土观念的产生与乡土的自然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。家乡的山川草木、风霜雨雪以及花虫鸟兽等等是人们自幼起就习见习闻的事物。人们一旦离家远出，来到陌生的异乡，往往大发感慨而生眷恋故乡之情。周密登蓬莱阁有感：“回首天涯归梦，几魂飞西浦，泪洒东州，故国山川，故园心眼，还似王粲登楼。”姜夔在作客合肥途中，只因“看尽鹅黄嫩绿，都是江南旧相识”，在诗中叹息不已。翁孟宾目睹异乡“卷西风，方肥寒草”，便忆起“吴楚几番风雨！”刘光祖咏败荷而“遥想江南，红酣千顷”。中国幅员辽阔、地理环境千差万别，各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异或雷同都会引发人们对于故乡的眷恋。

乡土观念的产生与乡土的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，这种社会关系首先是一种血缘关系。传统中国社会推行一套宗法家族制度，在这种社会，血缘关系被推到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位置。由于这种宗法家族制度，由于儒家“孝”的观念及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之类教条的熏陶，由于这

种制度和观念不仅针对“生”而且也针对“死”，所以家族村落、宗族区域不仅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也是自己的“祖宗庐墓之乡”。封建小农经济为世代居住于一地和同宗居住于一地提供了基础。中国人称乡土为“家乡”，正是反映了“家庭”、“家族”与“乡土”的融为一体。血缘性与地缘性的结合，无疑对乡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起了促进与加强的作用。

乡土特有的文化对于乡土观念产生的影响，尤值得注意。乡土特有的文化是本乡土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创造并沿袭下来的，它包括该乡土共同的生活习惯、神道信仰、道德观念和方言口语等等。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由于接受了相同的乡土文化，易于相互交往、易于相互理解而显得亲密。一旦离开本乡土，与异乡文化接触时，在许多方面会感到格格不入。近来香港流传一个笑话，一个香港人到北京旅游，到饭店吃饭，他很礼貌地问女招待：“小姐，水饺一碗要多少钱？”女招待怒目圆睁，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，原来这香港客的粤式普通话糟糕，被那女服务员听成“小姐，睡觉一晚要多少钱？”由于语言的差异，不同地域的人相互交谈，不是“鸡同鸭讲”，不知所云，便是笑话百出，尴尬透顶。语言如此，其他诸如生活习俗、艺术欣赏、信仰崇拜等等也同

此理。俗话说“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雷”，由于自然、社会、历史的原因，在中国，地域性的乡土文化相当复杂多样，从而促进了乡土观念的发展。

乡土观念又与政区结合在一起。因为乡土的自然环境并无什么明确的边缘，人们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家乡或是在水一方，或是在山一边，但不能肯定什么地带以外不是自己的家乡。乡土的社会关系除了以家人父子聚居所在为中心点外，其外缘也是谁都说不清的。乡土文化同样也无法在地域上确定一个明确的界限。但是客观的需要（如确定同乡和非同乡）要求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。这个标准自然而然地落在政区身上。政区在其划定时，已考虑到了地理上的、民族上的、社会文化上的种种因素，而且居于同一政区内的人民，在政治统治之下，自觉不自觉地加强了联系，增加了交往。

乡土观念在传统中国是十分强烈的。强烈的乡土观念使得从古代到近代的不少闻人以家乡地名为号，如袁项城（袁世凯，河南项城人）、黎黄陂（黎元洪，湖北黄陂人）等等。美不美，家乡水，亲不亲，故乡人。强烈的乡土观念使人产生强烈的思乡感情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大发去鲁之叹，说“迟迟吾行也”。汉高祖刘邦在天下已定、

归省故里的时候，“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，谓父老曰，游子悲故乡”！刘邦的父亲因思乡心切，过不惯京城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就让刘邦依照故乡丰的情况改建城市街里，称作新丰，又把丰人迁到这里居住，一切都恢复了故乡的景致，其中刘邦年轻时常去祭祀的“松榆之社”也未被遗忘而迁到新丰。“故人故情怀故宴，相望相思不相见”，“孤客一身千里外，未知归日是何年”，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因离家别居而产生的思乡悲吟作品更是时有出现，举不胜举。

古语道“楚遗弓而楚人得之”，乡土观念强化了同乡这一人群观念。古语又道“秦越人之相视，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”，乡土观念的强烈还使得人们只为同乡这一已群而不顾人群，出现了排斥异乡人的思想，客家人的存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。历史上，他们的祖先因战乱而由北方南迁到岭南一带，在当地长期居住，但历经了数代数十代后，仍不被当地土著社会所接纳，而被歧视为客籍。在如此强烈以致畸形的乡土观念下，人们以乡土为纽带建立同乡组织也就毫不为奇了，会馆就是一种同乡组织。

乡土观念的真正表现，在于“被乡土以外的事物所激荡”。同乡组织存在的外部条件，在于非同乡的存在，而且这个非同乡的力量与自己相

比是异常强大的，身处异地的同乡不组织成团体就难以立足、难以发展。如果在本乡土，自己就处于本乡土的文化与社会关系的保护之下，就无建立同乡组织的必要，除非在本乡土的异乡势力后来居上，势力压到了自己一方，身处本乡土的当地人感受到了威胁，才会同样组织起同乡团体。但是要组织成一个团体，自己一方也要有一定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包括人员的、经济的和社会的等方面。就上海来看，到了清代乾、嘉时期，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，有不少异乡人来到上海从事商业贸易和水上运输业等，来自部分地区的异乡人具有相当的实力，故而已有可能建立同乡组织——会馆。开埠之后，上海在经济、文化方面获得迅速发展，全国各地人士纷纷来到上海一展身手，许多地区的人士在上海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，因此会馆这种同乡组织纷纷建立。后来当异乡人在上海社会各个方面唱起主角后，土生土长的上海当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建立相应的同乡组织。

从会馆到同乡会

在上海，与会馆关系密切的还有公所。一般地说，会馆是同乡组织，公所是同业组织，但实际上，会馆与公所这两个名称有时互为混用。徽

宁会馆、泉漳会馆是同乡组织，商船会馆、木商会馆则是同业组织；布业公所，鲢业公所是同业组织，关山东公所，浙绍公所则是同乡组织。同乡会馆中含有业帮成份，如浙绍公所是由浙江绍兴人中的钱业、炭业、豆业商人建立；同业公所中含有乡帮成份，如商船会馆是崇明、锡金籍船商建立。也有一些组织既称会馆又称公所，如台州会馆又叫浙绍公所，海昌公所俗称海宁会馆。为了叙述方便，下文中一般以“会馆”表示同乡组织，以“公所”表示同业组织。

上海地区最早设立的会馆是清顺治年间（1654—1661年），建立的关山东公所，这里关东、山东旅沪商人购置的供不幸客死的同乡埋葬的公共墓地，它的影响并不大，后来在咸丰年间的战乱中荒废湮没了。直到光绪年间，旅沪山东人从碑石上发现了它，并在遗址上又建立起一个山东会馆。尔后建立的，则有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的商船会馆，那是行业组织。

会馆设置的真正起步是在乾隆年间，那时先后出现了四个会馆：乾隆初的浙绍公所（约1737年）；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的徽宁会馆；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的泉漳会馆，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的潮州会馆。此后到1843年上海开埠前，又增加了四明公所，建汀会馆、浙

宁会馆、揭普丰会馆、潮惠会馆、山西会馆、江西会馆。

这个时期，上海地区的经济活动以县城为中心，外地人来沪贸易者主要分布在城区周围，尤其是城东黄浦江畔一带。外地人在上海的发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里也就是会馆街、会馆后弄、会馆弄、会馆横弄之间的区域。最早设立的几个会馆中，商船会馆在城东马家厂，即会馆街一带，泉漳会馆在咸瓜弄，潮州会馆在洋行街，即会馆弄、会馆横弄附近。会馆街、会馆后弄、会馆弄、会馆横弄就是因商船会馆、泉漳会馆、潮州会馆等会馆的设置而得名。

上海辟为商埠后，很快成了全国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东方第一大都会。社会各阶层人士从全国各地汇集于此，旅沪同乡设立的会馆因而迅速发展。从乾隆年间到开埠前的一百余年间，上海建立的会馆仅十余个。但是开埠以后到清末近七十年间建立的会馆，至少有五十余个。据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上海指南》所载，新出现的有：湖南会馆、洞庭东山三善堂、广肇公所、平江公所、锡金公所、江宁会馆、京江公所、三山会馆、山东公所、四明崇义公所、徽州会馆、楚北公馆。此外尚有：星江公所、大埔会馆、浙金公所、淮场公所、淮阳公所、海昌

公所、台州会馆、嘉郡会馆、沪南三山会馆、江阴公所、常州八邑公所、金庭会馆、吴江会馆、常熟会所、江镇公所、丹阳公所、通如崇海会馆、扬州八邑公所、淮安（六邑）会馆、江淮公所、吴淞四明公所、定海会馆、舟山会馆、定海善政公所、湖州会馆、钱江会馆、浙严公所、温州会馆、南海会馆、顺德会馆、番禺禹山堂、全皖公所、蜀商公所、顺直会馆、登瀛会所、晋安公所、晋惠会馆、宝善公所等。

这个时期，租界地区经济发展，外地人在沪活动中心已由旧城区转至租界，并扩大到到闸北、浦东等地，会馆的分布也遍及上海各个角落。这期间，会馆也曾受波折，即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小刀会起义到同治年间太平军失败期间，由于上海城区战争频繁，各会馆或者成为军队驻扎营地，或者为战火毁坏，有的会馆就此销声匿迹，但也因为各地战事不断，外地人纷纷避居上海租界，从而有一些新会馆设立。

清末至民国初，同乡组织的发展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这便是同乡会馆的衰落和同乡会的代之而起。从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，会馆这种旧的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，政府、社会仅把它视为一般的慈善机构，而不把它作为同乡的代表机关。一个组织的存在，首先需

要合法化，即获得政治势力的认可，否则就难以生存，这也促使旧会馆向新同乡会的转化。同乡会的存在根据是民国初年的《临时约法》，它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。

清末民初，重庆各同乡会馆的财产成了地方当局注意的目标，为此旅渝各地同乡都想方设法保护会馆财产。1912年，湖北总督由黎元洪副总统担任，湖南总督由谭延闿（湖南茶陵人）担任，两人听说重庆湖广会馆发生危机，急电会馆领导从速成立同乡会，湖北同乡会和湖南同乡会就此成立，原湖广会馆财产由两会联合管理。由于上海有典型的租界地，本国的政治对会馆的作用要小些，但影响还是存在的。全国各地由会馆向同乡会的转化在加快，上海也不例外。

促使会馆向同乡会转化的另一原因，是同业会所转化为同业公会。清末，“洋货公会”首先出现。到1912年，同业组织已变得十分复杂，除了总商会性质的“商业公所”外，称作“会馆”的有三个，称作“公所”的有五十九个，称作“商会”的有五个，称作“公会”的有八个，甚至同一行业，既设有公所，又设有公会、商会的。到1923年，同业公会更见增多，除了原有组织大多存在外，继而设立的转为重要的有银行、汽车、面粉、证券、厂布、卷烟、电力、西药、金业、股

票、呢绒、油饼、杂粮、麸皮、运输、沪南轮船等公会。1927年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成立后，开始对工商团体进行整理。翌年十二月由社会局制订的《上海市工商业团体立案程序》公布施行，至此上海的同业团体都称作“公会”。作为同业团体的会馆、公所消失了，会馆、公所中的另一部分——同乡团体无疑会受到影响。

同乡会的出现是在清朝末年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，此前不久旅沪宁波人还曾一度建立过四明旅沪同乡会。不过到1913年江宁六县旅沪同乡会成立时，同乡会仍然寥寥无几。

同乡会的发展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到抗战爆发之前，这中间政府起了推动作用。民初《临时约法》规定了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，此后各种方针、政策的推行，特别是1931年前后《人民团体组织方案》的修正公布，更促进了同乡会的发展。据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1934年10月编印的《全国民众运动概况》的记载，上海市登记有65个同乡会。

同乡会取代会馆成为同乡人的代表机关，但是这种取代并不意味着会馆的消亡，会馆依旧存在。不仅原有的会馆存在下来，而且偶而还有一些新的会馆设立，如1919年浦东同乡建立了浦